

“文学现实主义”研究的历史新刻度：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二卷）现实主义》

A New Historical Scale for Research on Literary Real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Vol.2: Realism*

柳鑫宇 (Liu Xinyu)

内容摘要：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也是在我国本土文学与文化领域传播最为深入而广泛的，但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内涵最具复杂性或多变性的文学思潮之一。蒋承勇教授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二卷）现实主义》立足于崭新的学术基点，用新理念、新方法对19世纪西方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展开深度研究与阐释，力图揭示该文学思潮的本原性特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新观点，大大突破并廓新了国内该领域的既有研究。

关键词：《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二卷）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求真

作者简介：柳鑫宇，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英国诗歌。本文为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高层次项目【项目批号：2022YLZS02】阶段性成果。

Title: A New Historical Scale for Research on Literary Real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Vol.2: Realism*

Abstract: The Realism movement of 19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is a significant literary phenomenon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global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t holds a preeminent position due to its depth and extent. Nevertheless, the meaning and reception of Realism has been a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complexity, and variation. Professor Jiang Chengyong's latest publication,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Vol.2: Realism*, adopts an innovative academic perspective and employs cutting-edge ideas and methods to undertake a thorough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iterary trend. The book aims to uncover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Realism and put forward a set of innovative perspectives that substantial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existing body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China.

Keywords: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Vol.2: Realism*;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truth-seeking

Author: Liu Xinyu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whose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poetry (Email: liuxypeter@foxmail.com).

“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学术语，主要源自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且不说现实主义是否果真是“无边的”¹，但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变体”之多样性，还真有其“说不尽”（蒋承勇，“‘说不尽’的‘现实主义’”120）和常说常新的特质，所以迄今为止学界对它依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国，现实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还是创作方法、创作原则，长期以来其境遇颇为尴尬。一方面，“现代派文学的‘先锋性’及其对传统文学尤其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性，使不少人一度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过时’”（蒋承勇，“‘说不尽’的‘现实主义’”120）；另一方面，“无边的”、“说不尽”的“现实主义”因其指涉之庞大、内涵之丰富，令人望之而生畏，许多研究者不敢问津。不过，由蒋承勇教授撰写的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二卷）现实主义》（后文简称《现实主义》）一书，却直面这种学术上的“尴尬”，以作者惯有的反思既有陈规定论、挑战成见乃至“常识”的学术勇气，聚焦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皇皇约70万字的篇幅，对文学现实主义问题作了全新的阐释。这种反思性研究对我们了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理解文学现实主义及诸多文学现象和基本理论，进而深度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

一、“熟知未必真知”：作为文学思潮的“现代现实主义”

在诸多外来的文学思潮流派中，19世纪现实主义不仅是在我国本土文学与文化领域传播最为深入而广泛的，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内涵最具复杂性与多变性的文学思潮之一，但或许是因为当“现实主义”作为术语时，其含义实在过于丰富——“它可以指称一种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写作精神、批评标准和原则、艺术价值观等”（蒋承勇，《现实主义》44）²——当人们运用“现实主义”一词时，往往会自以为熟知内里，其实却指代不明，含糊其辞，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过去常说的“批判现实主义”。黑格尔曾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

1 参见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2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黑格尔 22-23）。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无论是作为文学思潮，还是一般性批评术语，都是需要细加辨析、深入研究的。

蒋承勇教授在《现实主义》一书中，首先在“导论”中阐明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背景和语境，梳理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百年传播与研究的历程，介绍了西方关于该思潮的研究概况，指出了我国学界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教训与不足，提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蒋承勇教授首先搁置诸多关于“现实主义”的别称，而把研究对象清晰地聚焦于作为文学思潮的19世纪现实主义，在第一章“现代现实主义：渊源与缘由”中，深入考察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背景，并将其定义为“现代现实主义”。正是在工业革命、科学精神、社会转型、价值观念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下，具有现代特性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才拥有了迥然有别于传统“摹仿现实主义”（mimetic realism）或“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的特征。

在我国学界，通常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modernism）文学泾渭分明，其审美范式和表现方法都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往往后者代表着文学的进步和创新，前者则意味着陈旧与过时。但蒋承勇教授不赞同这种对现实主义“过时”了的评价，他指出“文学史的发展，不存在割裂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与‘先进’，而永远只是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与延续”（2）。该著作首先厘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赋予“现代现实主义”以“现代”一词？换言之，相较于于既往由“摹仿说”（mimesis）主导的西方文学，我们如何在学理上论述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蒋承勇教授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质的规定性（45）。“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对峙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Bauman 10）¹。我们通常会认为，似乎只有浪漫主义（romanticism）、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和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才是富有“现代性”的。然而事实上，现代性的两幅基本面相——“社会现代性（或称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者叫‘文化现代性’）”——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在其内在本质与哲学的意义上，它们恰恰是西方现代化社会发展之一体两翼，它们共同以‘相反而相成’之张力促进和保障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西方文明的演进”（82）。正因如此，该著作冠之19世纪现实主义以“现代”一词，正是“因为其间无可否认地体现了‘社会现代性’之内涵。它表征了19世纪西方社会在理性与科学催化下现代文明急剧壮大以及现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82）。由此，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现代性”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同时，我们也得以借此反观：以往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往往偏重“审美”一端，而对另一端的“社会”则有所偏废。应当说，蒋承勇教授在书中的这一番阐释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现实主义》的第三、四章所阐述的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本质特征与最高宗旨——“求真”精神与“写实”传统。蒋承勇教授深度阐释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揭示了自然科学之类比方法与科学理性对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求真”精神之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论析了现代现实主义之“求真”追求在西方文学史上达成的历史新刻度、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及历史局限性。不惟如此，蒋承勇教授还通过探究实证哲学、实证理性对现代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之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细致辨析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与传统“摹仿说”和“摹仿现实主义”之间的传承性与差异性，指出了“变数”的“写实”与“复数”的“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关系及其当代价值。在后现代文化十分流行的当下，面对其裹挟而来的反本质主义、虚无主义、感官主义等倾向，蒋承勇教授做出了清醒且发人深省的判断：“现实主义和写实倾向的文学对我们的社会来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期待与需要”（304）。

可以说，蒋承勇教授在《现实主义》中的论述清晰、准确地展现了作为文学思潮的“现代现实主义”的诸多特质与禀赋，厘清了这个我们似乎“熟知”但实际上却常常语焉不详的概念，有拨云见日之功用。

二、“现代现实主义”的审美禀赋探究

在以往的一些教科书和参考材料上，通常用“批判现实主义”指称19世纪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语出高尔基，用它来形容19世纪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仅“批判”一词终究难以总括整个欧洲的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面貌。诚然，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以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高度的社会认识价值而著称于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审美功能与价值及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当代意义。正因如此，蒋承勇教授在《现实主义》的第六章“理性书写与现代现实主义的审美禀赋”中着重分析了现代现实主义除功利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之外，在审美特性方面所取得的独特成就及其所达成的历史新刻度。

蒋承勇教授指出，现代现实主义的创作大多是在“科学精神、实证理性支配下，强调细致观察和客观写实的基础上，对生活的真实再现与反映，是一种追求文本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理性化与形象化书写”（370）。由此，便也相应地体现出其所特有的艺术范式和审美理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环境—性格型”人物的典型塑造；情节与结构的事理逻辑与线型结构特征；叙述方

法上的从叙“事”、叙“情”到叙“心”的演变。

蒋承勇教授从西方文学史发展的宽阔视野出发,探讨了现代现实主义人物的典型塑造。他指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这一文学思潮的美学和艺术成就的重要贡献之一”(371)。作者通过对西方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性格类型”说进行追溯,揭示了“典型论”(371)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诸多变异与不同面貌;再通过返回到现代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对于连、拉斯蒂涅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人物形象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他们和环境的密切关系,继而将现代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归纳为“环境—性格型”。这些人物无不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性格型’典型因其不可磨灭的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其性格内蕴也必然地透射出特定时代之社会和生活的本质特征,于是,人物塑造本身也就是‘再现’或‘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途径(388)。应该说,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环境—性格型”人物在刻画的艺术水准上超越了过往偏于符号化、类型化的“观念—性格型”人物,把叙事文学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推向了西方文学史上的新的历史刻度。

除此之外,现代现实主义的审美禀赋同样表现在情节结构与叙述方法等层面。就前者而言,情节是人物塑造和描写得以展开的基础,人物性格要在情节的发展中才能得以刻画。因此那些经典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也有其独特、巧妙的情节结构,这种“对生动而完美之情节的追求,也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美学旨趣。而正是这种艺术与美学追求,使现代现实主义在西方叙事文学的情节与结构方面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成熟的境界”(397)。而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在叙述方法层面,则不仅反映了外部社会的广阔与真实,同时也对人的内心进行了实证式的研究,“揭示人的精神——心理的客观真实性,也是现代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创作的根本任务之一”(434)。从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到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再到司汤达(Stendhal)、托尔斯泰(Leo 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叙“事”、叙“情”再到叙“心”的演化路径。也正是在这种变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现实主义循着内倾性叙述的方向,为20世纪现代派文学更加向内转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的前因”(463)。

总之,蒋承勇教授对现代现实主义审美价值的深度发掘,深化了过往对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问题,并对我国当今的文学创作和大众阅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蒋承勇教授所言,我们今天所期待的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叙事抑或是两者结合的文学创作,讲好信息时代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故事,提高文学的现实性与可读性,让文学更广泛地走进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体现“为人民”的宗旨,都有必要在新的更高的意义上“回归”丰富的情节与精致完美的结构,对叙事文学来说,它们并不是可以任凭作家无限地“淡化”“解

构”“消解”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其根基性元素，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尤其如此。

三、文学思潮间“矛盾中的勾连”

历史是绵延的河流而绝非断裂的碎片，无论是昔日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所用的“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一词，还是如今我们所更常用的“文学思潮”（literary trends），都强调了诸文学现象在流变过程中彼此间紧密的、延续性的、难以切断的联系。但正如蒋承勇教授在著作“总序”中所指出的：

国内学界在文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撰写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科学倾向——一味强调“斗争”而看不到“扬弃”，延续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碎裂的断片。比如，就西方文学史而言，20世纪现代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是断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断裂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是断裂的。（17）

《现实主义》一书很好地回拨了这种对文学史理解的片面倾向。全书尤其注重在概念与概念的对立中寻找统一，寻找诸概念、思潮间“矛盾中的勾连”（88）。欧内斯特·伯恩鲍姆（Ernest Bernbaum）说过：“文学运动的主要特征最能从它的历史发展和攻击它的敌对运动中看出”（303）。在《现实主义》一书中，蒋承勇教授正是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彼此的“斗争”和“攻击”中寻求其“扬弃”与“联系”，对其异同点进行了深度的辨析。

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大文学思潮是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主义’”，但蒋承勇教授提醒我们“不能习惯性地将两者分裂甚至扩大两者的差异，而无视两者在相反中有相成、对立中有依存、反叛中有勾连的深层关系”（88）。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蒋承勇教授指出，既不能笼而统之地用“写实主义”将两者一锅煮，也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标尺削足适履地评价自然主义。在崇尚科学思维和实用理性这一方面，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同根同源性，因此它们对现实生活有共同的“写实”追求。当然，自然主义又有其特有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追求，自然主义作家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接受观念的统摄以文本‘再现’生活”，由此开拓的“显现”理论不仅达成了对浪漫主义之“表现”与现实主义之“再现”的超越，也达成了自然主义对20世纪现代主义之

“内倾性”风格的接续。¹

最后，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蒋承勇教授从现代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切入，指出不同作家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使得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叙述方式在总体上呈现出“内倾型”和“外倾型”的区别。这两种不同倾向的艺术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各有侧重和特点，“前者在展示心灵世界上更具直接性、真实性和深刻性，而在再现外部社会形态上趋于主观性、宽泛性；后者则在再现外部社会形态上更具直观性、真实性和广阔性，而在表现心灵世界上则趋于间接性和粗略性”（533）。当我们沿着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向后看去，可以发现20世纪现代主义一方面把内倾型传统发扬到了新的境界，空前地强调人的主观性和非理性世界；同时其也在另一方面沿着外倾型传统的路径与“20世纪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刻求外形摹写之真的新小说派相沟通”（534）。

当然，该著作中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决不仅限于笔者所谈及的这些层面，且这些问题也只是《现实主义》一书中的部分话题。但透过这些讨论我们已不难发现，眼下对“现实主义”这一领域的探索亟需拓展，一如蒋承勇教授对学界的呼吁：“对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和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研究不应该总是停留于‘过去时’状态，满足于一些一般性的乃至常识性的认识（……）而应该拓宽视野与思路，更新观念与方法，始终使这种研究保持‘进行时’状态，不断展开深度阐释”（537）。

可以说，该著作的研究不仅更准确、透彻地认识与把握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本原性内涵与本质特征，更揭示了这种文学史发展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与延续，其学术价值是超越现实主义问题研究本身的。另外，该著作的行文典雅质朴，大巧不工，没有种种故作晦涩的、过度精英化的“行话”和术语，令人读之如沐春风。总而言之，《现实主义》立足于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广泛吸纳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以该书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洞见之清晰、研究之深入、创新之巨大，当无愧为国内“文学现实主义”研究的历史新刻度。

Work Cited

Bauman, Zygmunt.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Bernbaum, Ernest. *Guide Through the Romantic Movement*.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49.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Garaudy, Roger. *Infinite Realism*, translated by Wu Yuetia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1 参见蒋承勇、曾繁亨：“‘屏’之显现——自然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学本体论的重构”，《外国文学》1（2019）：108-120。

[Hegel, G. W. F.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lated by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蒋承勇：“‘说不尽’的‘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研究的十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0（2021）：120-132。

[Jiang Chengyong. “On the Top Ten Issues in the Study of Re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Front* 10 (2021): 120-132.]

——：《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二卷）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vol. 2: Real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2.]

蒋承勇、曾繁亨：“‘屏’之显现——自然主义与西方现代文学本体论的重构”，《外国文学》1（2019）：108-120。

[Jiang Chengyong and Zeng Fant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Essentialist Poetic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nt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9): 108-120.]